

戰時中共的規訓系統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斯大林有句名言：「人才、幹部是世界上所有的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」，「幹部決定一切」。¹ 這句話出自強調能動性的革命政黨領袖，鑄有深刻的共產主義運動歷史的烙印，又嵌入此後共產主義革命的實踐。斯大林這一論斷，抗戰時期即為毛澤東引用並深切體會，仔細觀察中共的歷史，可以發現「幹部決定一切」不是一句空談，而是落到共產黨革命歷史的實處。

幹部決定一切，字面上說的是幹部的重要性，其實更在說培養幹部的重要性，這是一個塑造革命者的過程。中共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精力，打造了一個環環相扣的訓練系統。革命者，尤其是一批面向基層的中低層幹部的塑造，事實上構成革命成敗的決定性因素。正因為有一批瞭解中共宗旨、願意為黨奉獻的幹部的存在，中共的革命系統運轉才那麼游刃有餘。中共是個剛性、高效的政黨，革命巨輪滾滾行進時，摧枯拉朽，一往無前。革命運動中那些具體的人——幹部，就是革命巨輪前的清道夫，或者糾錯機制中的緩壓閥和承重器。中共體制的特殊之處在於培養了一批能夠、也願意為黨付出的幹部，這些幹部所擁有的特殊的素質，在中共話語中被稱為黨性。關於黨性，劉少奇的表述，基本代表中共黨人的認知：

每個黨員的思想和行動中，都要使自己的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完全一致。在個人利益和黨的利益不一致的時候，能夠毫不躊躇、毫不勉強地服從黨的利益，犧牲個人利益。為了黨的、無產階

1 〈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的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上的講話〉（1935年5月4日），《斯大林文選》上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，第35頁。

級的、民族解放和人類解放的事業，能夠毫不猶豫地犧牲個人利益，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，這就是我們常說的「黨性」或「黨的觀念」、「組織觀念」的一種表現。²

講黨性，簡單說，就是理性上要衷心信服黨，情感上也要完全皈依黨，身心系統都要交給黨。這是中共對自己黨員的基本要求，對局外人來說則是極高的標準。把一個個有著七情六欲的普通人塑造成具有黨性的黨員，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需要不斷地教育、灌輸、改造、清洗，需要形成制度保障和文化氛圍，需要情感的喚醒、動員和激發，這是一個環環相扣的系統工程。當年中共為達致這樣的目標做了極大的努力，所獲得的結果，就是一批常被敵對方驚呼「可怕」的幹部群體的出現。

-
- 2 劉少奇：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〉，《劉少奇選集》上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130–131頁。羅瑞卿列舉「黨性」的十條標準：「①黨的利益高於一切，黨員個人的利益服從黨的利益。②共產黨員要做到對黨沒有絲毫隱瞞。③共產黨員要善於把黨的政策徹底實現。④共產黨員要善於團結群眾，不要孤高、宗派主義而脫離群眾。⑤共產黨員要從政治原則上團結人而不是感情用事和私人拉攏。⑥共產黨員要能顧全大局，不是本位主義。⑦共產黨員要絕對信任黨，相信黨的力量。⑧共產黨員要力求進步，不驕傲自大，不輕視群眾。⑨共產黨員要有高度的自我批評的精神。⑩共產黨員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，一點一滴的工作作風，理論與實際聯繫，思想與行動統一。」（羅瑞卿：〈在連隊政治工作會議上的報告〉（1941年8月26日），《羅瑞卿軍事文選》，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310–311頁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，恩格斯最早提到黨性這一概念，列寧則做了具體闡發，中共基本是在列寧的框架之內使用黨性。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：具有版權的資料

一、幹部養成的路徑

1949年前的中共幹部，形成幾個比較明顯的代際群體，即通常說的長征幹部、三八幹部、南下幹部，分別對應中共革命歷史的幾個重要階段。其中三八幹部群體出現於抗日統一戰線時期，知識水準最高。這一代中共幹部，面對相同的時代背景，擁有相似的出身和思想進路，受進化論熏陶，相信美好，相信未來，相信歷史車輪的滾滾向前。韋君宜的回憶大致說出了那一代革命者的心聲：

我在學校本來是很不錯的學生，在中學屢次得獎，入大學讀哲學，也覺得金岳霖的邏輯、馮友蘭的哲學史什麼的很有味道，實在。而休謨的人性論，使人深思，得一種思辨的快樂。但在決心入黨之後，我把讀書所得的一切都放棄了。我情願做一個學識膚淺的戰鬥者，堅信列寧、斯大林、毛澤東說的一切，因為那是我所宣佈崇拜的主義。我並沒有放棄一向信仰的民主思想，仍想走自由的道路。但是共產主義信仰使我認為，世界一切美好的東西都包含在共產主義裏面了，包括自由與民主。我由此成了共產主義真理的信徒。

這些「單純到透明」¹的青年人，是後來歷經思想風暴的人們無法比擬和理解的。需要信仰的中共，能夠擁有這樣一批願意相信的年輕人，不能不說是莫大的幸運。

儘管信仰是凝聚革命者的有效思想資源，但信仰畢竟不是一天兩天可以練成，革命的群體仍然由一個個個體構成，而且，由於知識分子²比例較高，他們又是相對具有獨立思考意識的一群。面對這樣一個以知識分子為主的群體，中共如何一步步把他們導入黨的軌道？革命理念如何進入內心世界，並外化為具體行動？如何在建構向心力、營造鐵的紀律同時保持內部的生機和活力？在思想教化、組織規訓、信仰歸一的養成過程中，幹部的主體意識是否存在，如何可能，和黨的意志有怎樣的互動？這些普通人的思想意識和經歷，在通常的檔案文獻中並不容易見到，所幸，當年一批親歷者的日記可以讓我們體觸到鮮活心靈的搏動，而整風中大量的思想彙報由於「靈魂深處革命」的要求，也提供了可供參考的第一手資料。儘管這些記憶有著強烈的個人色彩，內中也不乏特殊政治環境下的刻意造作，仍然不妨礙由此探蹟索隱，窺察中共幹部大規模養成的過程，以及在此過程中，個體、群體及政黨機器的多方互動。

- 1 韋君宜：《思痛錄》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、6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韋君宜這段話說到她把自由民主融入共產主義信仰，應該不是個案，而是中國許多共產主義者的共同經歷，中國的共產主義傳統中，其實還存在自由主義的基因，這一點值得重視，也是理解改革開放思想資源的一個重要線索。
- 2 知識分子是個不斷變化中的概念，不同學科有不同的定義方式。本書主要從社會功能角度著眼，以其承擔的社會角色作為定義知識分子的標準。從這樣的標準看，1930、1940年代，高小以上文化水準者，事實上就在鄉村被視為文化人，承擔著傳播社會文化的功能。張聞天主持的「延安農村調查團」在興縣所做調查，即把高小以上水準者歸入知識分子。（岳謙厚、張瑋輯注：《「延安農村調查團」興縣調查資料》，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，第64頁）這樣的社會角色又促使他們不斷豐富自己的知識文化修養，社會角色和個人素質及定位之間，本來就是動態循環的過程。

抗戰時期大批幹部的養成，既是中共大發展的結果，又是中共實現大發展的基礎。由於民族戰爭的環境，抗戰時期中共幹部的養成，既包含了一貫堅持的階級立場，又有相當的特殊性。大量使用、提拔工農幹部，當然還是中共的基本立場，在戰爭中繼續造就軍隊幹部，更是戰時的題中應有之義。與此同時，知識分子幹部得到大規模擴展，「三八幹部」群體這一特色，對中共幹部隊伍氣質的變化及整體提升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影響。本書接下來講述的，就是以「三八幹部」為主體的整個中共幹部體系的養成過程。

1. 「三八幹部」：為有源頭活水來

以學生身份來到延安，進入革命陣營，可謂抗戰時期中共新幹部即所謂「三八幹部」的典型來源，這是中共獲得的一股新鮮血液。此時，在統一戰線旗幟下，中共階級關係判斷做出調整，知識分子被納入民族革命陣營，緩解了蘇維埃時期幹部選拔中習見的無米之炊的尷尬。毛澤東說：「我們要造就大批的民族革命幹部，他們是有革命理論的，他們是富於犧牲精神的，他們是革命的先鋒隊。只有依靠成千成萬的好幹部，革命的方針與辦法才能執行，全面的全民族的革命戰爭才能出現於中國，才能最後戰勝敵人。」³「民族革命」幹部的定義大大擴充了幹部來源，使一直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、強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中共有了更多解釋和操作上的彈性，對於堅持理論和話語神聖的共產黨人而言，這樣的空間並不總能輕易獲得。

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，中共自建黨以後即仿效蘇聯，構建一套自身行為的意識形態解釋體系，這樣的解釋體系極大有助於政黨的自我認同和身份塑造，是共產黨人的重要特質之一。正因此，中共的革命實踐常

3 毛澤東：〈目前的時局和方針〉（1937年11月1日），《毛澤東文集》第2卷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63–64頁。

常呈現理論先行的特徵，民族革命的路線轉變也不例外。1935年後，根據共產國際指示，中共從蘇維埃革命的立場逐漸轉型，向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發展。統一戰線的解釋邏輯是：民族危機的刺激，導致國內階級關係變化，民族資產階級乃至大地主、大資產階級有了投身抗戰的可能，從最廣泛團結各種抗戰力量出發，可以也應該與他們結成統一戰線。統一戰線的階級基礎，劉少奇說得很明白：「統一戰線教育，只是階級教育的一部分。因此對勞動階級的教育，應是全盤的階級教育，只強調統一戰線是不對的。」⁴ 統一戰線新形勢下階級及社會關係判斷的調整，也導致對知識分子認知的調整，儘管在當時，這一調整不是那麼引人注目，卻對中共革命的未來影響深遠。

1927年蘇維埃革命開始後，國民革命時期的階級聯合局面終止，知識分子作為小資產階級陣營被視為革命的動搖分子，清洗知識分子的言行不斷。1930年代初、中期，蘇聯對知識分子的判斷逐漸變化，波及中共微調內部政策，知識分子處境有所緩和。1936年，蘇聯通過新憲法，提出蘇聯社會已經不存在彼此對抗的階級，社會由工人和農民這兩個互相友愛的階級組成，知識分子不再由於階級屬性成為異類。1939年召開的蘇共十八大總結報告提出：「在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條件下，知識分子已經成為真正人民的知識分子，他們同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有緊密的聯繫，他們是蘇維埃社會中、蘇維埃社會的經濟文化發展中的巨大力量」；要求：「徹底消除當時還存在的對知識分子不信任的心理，消除革命前流行的對知識分子的看法的殘餘。」⁵

蘇聯對知識分子態度的變化清楚體現於蘇共兩個黨章之中，蘇共十七大制定的黨章規定：「黨領導無產階級、勞動農民和全體勞動群眾為

4 〈劉少奇同志關於群眾運動及其他問題的報告〉（1942年12月9日-10日），《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時期資料叢書》第8卷，第一二〇師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抗日戰爭史編寫辦公室1994年版，第189頁。

5 波諾馬廖夫主編（譯者不詳）：《蘇聯共產黨歷史》，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60年版，第545頁。

鞏固無產階級專政、爭取社會主義勝利而鬥爭。」⁶ 十八大通過的黨章相關表述修改為：「黨領導全體蘇聯人民——工人階級、農民、知識分子，為鞏固工人階級專政、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、爭取共產主義勝利而鬥爭。」⁷ 兩相比較，十八大特別將知識分子和工人、農民並列，這是蘇共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的邏輯結果。由於當時中共幾乎全盤接受蘇共的理論指導，蘇共的態度轉變，和建立民族統一戰線要求結合，引領著中共知識分子政策的調整。

從1936年開始，中共中央北方局著意在平津和北方地區開展青年學生工作，吸引一批青年知識分子左傾化。此時，急迫的民族危機強烈刺激青年知識分子的民族情懷，中共以民族救亡相號召，異議者的身份和抵抗者的姿態極易引起不滿現實的青年人的共鳴、奠定在青年中發生影響的基礎。抗戰爆發後，學生的民族主義情緒、北方的地緣關係及中共此前在都市打下的基礎相結合，使一批知識分子選擇前往中共控制區域。以延安論，當時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湧向延安，中共也加意吸納。抗日軍政大學第1期學員基本是紅軍幹部，從第2期開始，吸收知識青年學員609人。1938年4月開學的第4期，5,562個學員中，來自全國各省市的青年學員共4,655人，佔學員總數的83%，遠超部隊和地下黨幹部的907人。第5、6期學員則以根據地內的知識分子或出身「小知識分子」的基層幹部為主。抗大成為消化青年知識分子的熔爐。

同樣吸納、培養大批知識分子的還有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等。如果說延安抗日軍政大學起初的培養對象主要是軍政幹部，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一開始就定位為知識分子人才的培養。陝北公學創辦於抗戰初期，面向全國招生，一般要求新生「有中等文化水平」。⁸ 校長成仿吾回憶：「七七事變後最初幾個月，由於國共合作，國民黨在一定程度

6 〈全蘇聯共產黨（布爾什維克）黨章〉（1934年1月），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室編：《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》，求實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64頁。

7 〈全蘇聯共產黨（布爾什維克）黨章〉（1939年2月），《蘇聯共產黨章程彙編》，第82頁。

8 成仿吾：《戰火中的大學》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9頁。

上開放黨禁，實行一些民主，國統區青年到延安來比過去順利些，幾乎每天都有幾十人甚至上百人湧到陝北公學來，幾天就可以編起一個隊。」⁹成仿吾所說國統區青年湧向延安，除國共合作的大環境提供了可能外，與延安學制靈活也有關係，隨時招生、招滿編隊，滿足了一批流亡大後方、求學無門的失學青年要求，這使中共在國共的人才競爭中佔得先機。相比國民政府堅持戰時教育的正規化，中共教育強調速成，尤其是政治思想上的速成，按照毛澤東的說法：「我們不在乎像其他學校那樣照著書本一章一章地來上課，而在乎學習一種作風，一種方向。……你們在陝公裏可以學習到一個方向——政治方向，同時又可以學習到一種作風——工作作風。」¹⁰

中共這一階段吸收知識分子的成績，毛澤東1939年有一個總結：

幹部教育兩年來，在中央直接指導下建立了抗大、陝公、黨校、馬列學院、魯藝、青訓班、女大、工人學校、衛生學校、通訊學校、組織部訓練班、行政人員訓練班、邊區黨校、魯迅師範、邊區中學、魯迅小學、兒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學校，學生多的萬餘人，少的幾百人幾十人，幾千個幹部從事教育工作，教育出來的及尚未出來的學生三萬以上。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，十八年來未有過的現象。這些學生現在還不能看出他們大的工作成績，但數年以後就可以看見了。¹¹

數年後中共越來越堅強的幹部體系的出現，印證了毛澤東的這一說法。

需要說明的是，如果不是搭上中共在大城市招收青年學生的便車，當年一般人投奔延安並不容易，需要相當的先期投入。戰爭初期投奔延安的何方回憶：

9 成仿吾：《戰火中的大學》，第42頁。

10 毛澤東：〈對陝北公學畢業同學的臨別贈言〉（1939年3月3日），《毛澤東文集》第2卷，第108頁。

11 毛澤東：〈反投降提綱〉（1939年6月），《毛澤東文集》第2卷，第223頁。